

回忆五十年代 创建新善本手稿特藏库的经过

冯宝琳 *

1952年底，冯仲云馆长来到了北图。他以无比的革命豪情和雄伟的气魄对北京图书馆进行了大力的整顿与建设，把旧北图改造成为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国家图书馆。在抓馆内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同时，为了迎接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他高瞻远瞩，大抓图书馆的业务建设，我馆的新善本与手稿的征集特藏，就是冯馆长首先提出并直接过问而创建的。

那是在1953年底，冯馆长调我到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给我的任务是先搞新善本、手稿的征集收藏工作。他亲自召开会议，研究收藏范围，确定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先生提出的新善本要具有思想性、历史性和艺术性三个条件，或具其中之一条，但是要着重在稀有罕见上。本着领导上的指示精神，我就从无到有边学习边干起来了。在那些日子里，为了广泛开闢书源，到处进行搜集挑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居然收集到一些罕见的革命文献。到了1956年初，基本上略具规模。以后，我的工作重点转到中外文舆图，同时也兼顾新善本手稿，待到1965年移交给善本组时，新善本已达到6500种7300册张左右了。

（一）新善本

我是从下列几条渠道进行挑选搜集的：

1. 从中文采访组新购进的旧平装书中挑选。
2. 有目标地从私人捐赠书中挑选。
3. 从抗战时期旧北图在昆明办事处的中日抗战史料会藏书中挑选。
4. 从大书库已编目的书笈中挑选。
5. 从图整库简编的旧平装中挑选。

6. 从熟悉出版情况的前辈们进行请教，探索书源，动员出让。

那时各书店送来出售的旧平装书很多，只要细緻耐心挑选，往往可以选到很好的书。两份刻腊版油印毛边纸本的党内文件就是从书店送来的旧书中发掘的，可以说这是现存的唯一孤本了。柳亚子先生有许多藏书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在这批赠书中，我挑选出：1922年9月至1926年出版的《响导》，1923年7月广州出版的《前锋》，1923年10月至1926年出版的《中国青年》，1924年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的《中国工人》，1926年广东省农民协会出版的《犁头》……。这些罕见的党刊、团刊和指导工人、农民运动的革命刊物。其中还有许多罕见的早期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感谢柳亚子先生的精心收藏，丰富了北图的新善本库。感谢出版界的前辈张静庐先生，承蒙他的帮助，使我得以开阔眼界受到教益。有一次，我看到张先生辑注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有一幅中央苏区1934年出版的《列宁略传》的书影，真是不胜欣羡之至。我对张先生说馆藏的老苏区出版品太少，希望张先生代为动员他的朋友将此书转让给北图。经过张先生的说项，得到允诺，这一老苏区出版的罕见书，不多久就邮寄来了。更要感谢李一氓同志，当他在维也纳任外事工作时，从旧书店买到革命导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初印本、法文译本和英文译本，还有列宁在国外出版的俄文著作多种，承他热情地转让给国家图书馆。还有，他刻意访求收购到的马克思亲笔写的英文信，也由国家文物局调拨给了北图。这更使

北图的馆藏增添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瑰丽光彩。新善本库就是这样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帮助下，使库藏逐渐地丰富起来了。

要大书特书的是，我们曾经征集珍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书札手迹。从中国作家协会罗烽同志那里征集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亲自用铅笔写给罗烽同志的两封信。承蒙罗烽同志对国家图书馆的无比信任，慨然惠予赠送，使北京图书馆新善本库有了镇库之宝。毛主席的伟大诗词《蝶恋花——赠李淑一》在报纸上发表以后，经多方探询，打算进行征集，一天下午在三里河见到了李淑一同志，我恳切地请她将此墨宝赠给我馆，承李淑一同志慨然应允，无私地将已装裱成册页的毛主席亲笔致李淑一同志的两封信，赠给了北图，使国家图书馆的库藏增添了无可伦比的灿烂光辉！虽然，毛主席的手稿书札现已转交中央，但是北京图书馆却曾经一度光荣地珍藏了这些宝贵的手迹。

从事新善本革命文献的征集挑选工作，虽然没时间也不可能将每一本书都仔细翻阅学习，但对每一种书的著者、出版者和内容都要进行一些了解和辨认。时间已飞速地流逝，离现在已是二十七、八年的往事了，但是有一些书回忆起来，它的开本大小、封面图样、纸张颜色等等，仍然是历历在目。现将记忆所及按各革命时期开列一些罕见书刊，以资纪念当时的筹建新善本的收获。

一、五四运动及党成立前后的书刊

《觉悟》 周恩来主编 1919年12月天津出版。

《劳动界》 1920年10月上海新青年社出版。

《向导》 党刊 1922年9月创刊。

《少年》第二号 周恩来等主编 1922年8月巴黎出版，油印本。

《前锋》 1923年7月广州平民书社出

版。

《中国青年》 团刊 1923年10月20日创刊。

《共产党礼拜六》 列宁著 王静译
1922年1月广州人民出版社初版。
《新俄国游记》 瞿秋白著 1922年
上海商务初版。

《二七工仇》 1923年湖北工团联合会。
京汉铁路总工会联合办事处出版。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书刊

《青年平民读本》 1925年7月上海书店出版。

《学生联合会第七届全代宣言及决议案》 1925年7月出版。

《农民协会章程与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 1925年广东农协出版。

《济难》创刊号 1926年1月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出版。

《政治周报》第9期 1926年4月广州出版。

《省港罢工中之中英谈判》 邓中夏著
1926年7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编印出版。

《海丰农民运动》 1926年10月广州国光书店出版 农民协会丛书。

《俄国共产党党纲》 1922年1月初版
1927年3月武汉长江书店第6版。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书刊

《列宁青年》 第4期 共青团闽粤赣省委1931年10月汀州出版。

《列宁略传》 1934年7月中共中央局瑞金出版 斗争丛书第三种。

《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 列宁著 陈光达译 1931年7月上海华兴书局再版。

《布尔塞维克》 在白区出版。2卷10期
(1929年9月1日出版)3卷1期(1930

年1月15日出版)书封面伪装题书
名：“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商务印
书馆出版”

4卷1期(1931年出版)书封面伪装题
书名：“中国古史考索钱玄同编著。”
《十二九周年纪念特刊》 1936年12月
燕京大学学生会出版。

四、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书刊

《解放》党刊 1937年4月24日创刊，
延安出版。
《抗战》创刊号 1939年2月安徽泾县
出版。新四军机关刊物
《论持久战》 毛泽东著 1938年7月
解放社初版，抗日战争研究会编
抗日战争丛书2
《抗战政治工作纲领》 周恩来著
1938年1月上海明月书店出版。
《论抗日游击战争》 朱德著 1938年
11月解放社出版。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 聂荣
臻著 1939年5月八路军军政杂志
社出版。
《生产战线上的抗大》 抗大编审委员
会编 1939年6月抗大政治部出版
抗大丛书之四。
《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
刘少奇著 1940年藁城人民书店石
印本。
《鲁迅论文选集》 1941年新华日报华
北分馆铅印红绿色油光纸本。
《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著 1942年
1月冀鲁豫边区文化出版社木刻袖
珍本。
《文教先锋》 山西平顺县文委会编印
1947年10月出版 油印本。
《人民武装斗争经验》 1947年太行区
武委会出版。
北图新善本库收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

作很多，不同版本的选集和著作单行本约有二百五十种二百七十册左右。《毛泽东选集》有1944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编印出版的五卷本，这是选集最早的本子。1947年3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印出版的六卷本。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出版的两卷本。这三种不同卷数的选集；又有1945年7月苏中出版社；1947年3月渤海新华书店；1947年6月新华书店冀东支店；再加上1948年东北书店的，就有了很多的不同版本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论联合政府》都有着二十个以上的不同版本，分别在各边区根据地出版发行，其他著作也都有许多在各地出版的不同版本。为了向住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中国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还出版了一些伪装本，书封面上伪装题书名为“高小论说精华”、“新山海经”、“大乘起信论”等等。为了便于携带，开本很小，有以袖珍本和小册子形式出版发行的。在解放区还出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单行本多种，还出版了许多《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和《马恩丛书》，在这里就不详细列举了。解放区出版的革命书刊起到了宣传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积极作用。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精装精印本
(从略)

附：辛亥革命前的罕见书刊文物
《太平救世歌》 太平天国官书 甲寅
(1854年)木刻本
太平天国门牌 木刻单页
《訄书》章炳麟著 中国开国纪元4594
(公元1896)年出版
《革命军》邹容著 中国开国纪元4602
(公元1904)年出版。
《汉帜》1、2期 黄一铸主编 中国开
国纪元4605(公元1907)年出版。
《中国女报》第二年第一号 秋瑾主编
丁未年(1907)正月出版。

经过两年的工作与学习，结合新善本革命文献的入藏实际，在1956年拟订了入藏新善本珍本书籍的标准（初步草案），现记述于下：

一、革命文献

1. 早期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
2. 毛主席经典著作、稿本、书札和手批本等。
3. 党内负责同志的著作原稿和印本的最初版本。
4. 建国前，各革命时期各根据地所印行的初版，油印和非铅印的已成罕见的出版物。
5. 建国前，各革命时期的地下出版物。
6. 各革命时期各根据地的艺术出版物（具有政治性、代表性和纪念性的美术印品和原作）。
7. 建国前，各革命时期的文书、布告和传单等，具有一定历史性纪念性的实物。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历史性纪念性的精装本。

附：革命导师马、恩、列、斯的手稿书札和珍贵的早期各种文字译本。

二、近百年来的出版物（作为新善本的附录，其中有仅为内部保留者）。

1. 鸦片战争以来，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历史性，在当时为鼓吹进步思想的著作之最初版本。
2. 早期介绍马列主义和早期出版的有关进步思想的书籍之最初版本和译本。
3. 近百年来鼓吹革命的秘密出版物。
4. 近百年来重要史料的原稿和最初版本。
5. 具有时代性和革命性的各种典型著作的最初版本或最后印本（指被禁被检查的进步书刊）。
6. 1927年4月12日以前，鼓吹革命的书刊（包括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兴中会的出

版物及未叛变革命前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左派的出版物），但须具有代表性与罕见性。

三、艺术出版品及有限出版的书籍

1. 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最好的艺术印品和原作。
2. 装璜美好、印刷精良，比较罕见的精装本和豪华本。
3. 名贵的艺术复制品。
4. 不超过印数一千部的有限出版品。

这个入藏标准的草案是根据两年来收集新善本革命文献，进行挑选搜求的实际体会初步拟订的，也是本着这个入藏标准而进行取舍的。当然，限于水平，又没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仔细地阅读挑选，很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合格的书刊收进来了，那就还要再进一步的精选，力求完善的了。

（二）作家手稿

征集作家手稿的工作也是在1954年开始进行的。冯仲云馆长认为北京图书馆应当建设成为亚洲图书馆的明珠。在1953年虽然已拥有八百多万册藏书、二十余万册善本书，但是却缺少革命文献及著名作家手稿墨迹的专藏。他指示在搜求新善本革命文献的同时，也要注意征集手稿建立专藏。我认为征集手稿，那就要很好地学习近代文学史，要熟悉文学界的往事，了解辛亥革命及五四以来有哪些著名作家？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哪些主要的文学团体？其代表人物是谁？著名作家们的情况如何？其周围的人们都是谁？只有把这一切摸清楚之后，才能确定征集目标，根据这个目标就要想方设法去寻找线索。寻找作家或作品手稿的线索是征集手稿的重要的一环，既要翻阅有关文史书刊，也要多多注意文艺动态，有重点地拜访熟悉文学界出版界情况的老前辈，在有目标的谈话中往往能找到一些线索，得到所要寻求的作家的下落。

我进行征集手稿的方式大体上有三种：一是通过组织写信征求，一是登门拜访当面动员，还有是托人代为转达，俟时机成熟再进行征求。当然，动员作家学者把自己的著作原稿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作为特藏保存起来，并供应重点读者进行专题研究，只要原稿尚在，大多数人是信任国家图书馆，愿意把自己的手稿捐赠出来。但是工作中也还是有不少困难的，如有些早年的著名作品的原稿几经动乱或迁徙频仍很难找到了。有一些著名作家的手稿已经遗失或销毁掉了，还有收藏者特别珍爱所藏的手稿，不愿意拿出捐赠，这只好多方设法，等待时机再行动员了。总之，这一征集工作有的是很顺利地找到线索，经过动员即可拿到；有的是比较困难要费一些周折的。我的体会是依靠组织、领导和群众，再加上各方面的支持与合作，尤其是作家与他的家属以及出版者的协助，就能够搞好征集并可做出成绩的。

为了更快更好地进行工作，采取了两种方法同时进行征集。一是征集著名作家学者的代表作的原稿，虽然仅仅是一两种，但这是作家毕生精力的最佳成果，是具备珍藏条件，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另一种方法是慎重寻求著名作家学者的全部手稿，他的著作面广、学术水平高，每一种著作手稿都值得珍藏起来传之久远，这样征集到的手稿种类数也就会多起来。在征得领导上的同意后，就专心致力于寻求闻一多先生著作手稿的下落。我知道当时的副市长吴晗和闻一多先生的战斗友情很深，如向他询问闻先生手稿下落及家属的情况，一定会得到确切的线索。于是，就拿着图书馆的介绍信，大胆地去拜访吴晗同志。这位人民的副市长，一点“架子”也没有，立即接见了我，承他告诉我，闻先生的弟弟闻家驷教授在北大，可以去向他探寻手稿的下落。随后，就见到了闻一多的夫人高孝真同志，向她说明征集的目的。我们都有保存好闻一多先生手稿的共

同愿望，承高孝真同志闻立鹤同志等对国家图书馆的信任，慨然答应了将闻一多先生所有著作手稿全部捐献。这批珍贵的手稿连同闻先生治印印谱和少数画稿，共有198种9000多页，这一大宗手稿就给手稿特藏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拜访吴晗同志时，我也向他征集《从僧体到皇权》的原稿，可惜早已丢失。他把改写的《朱元璋传》手稿，赠给了图书馆。我对郭沫若同志在重庆时所写的《屈原》等五个剧本是早已闻名，为了征集这五个剧本的原稿，是颇费一番周折的。刚一接洽时，得到的答复是郭老的手稿全堆放在一起很乱，不好找。再次进行征集时，王秘书回答说：“等以后手稿整理出来时再说”。从这句话中我得到启发，找到了钥匙，我向领导上提出建议，由我花费一些时间整理郭老的手稿，就此征集那五个剧本的原稿。经领导上的同意之后，连续几天去到郭老家中进行整理手稿，按类按年代先后秩序，进行编目，点清手稿页数，编写出郭老著作手稿目录；经秘书科打字同志的积极配合，很快地将打印装帧好了的手稿目录清册，送给了郭老。同时也蒙郭老把《屈原》、《南冠草》、《棠棣之花》、《孔雀胆》、《筑》五个剧本的原稿赠送给了我们的图书馆。当我们写信向茅盾同志征集他的著作手稿时，他回答说《子夜》、《春蚕》和《腐蚀》的原稿早已毁失。但他将一册铅印《腐蚀》的亲手硃笔校改本赠给了我馆，又将《清明前后》、《团圆媳妇》等著作手稿七种赠给我们了。最为珍贵的是，他将保藏多年的1925年8月在商务印书馆工会领导工人对资方进行斗争时，茅盾同志亲笔写的《复工条件》的原稿捐赠给我馆，这是具有革命性、历史文物性的珍贵手稿。茅盾同志当时任文化部部长，对于北图的征集作家手稿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我去拜访叶圣陶同志征集叶老的《倪焕之》原稿时，因原稿已经散失，叶老除答应

将现存的手稿赠给我馆，又将《倪焕之》的最初版本一册送给北图，计手稿4种21页半，又书1册。他还亲自带我去见张静庐先生，让我向张先生了解马列主义书籍在上海的出版情况；又介绍我去见徐调孚先生询问著名手稿的下落。叶老的热情关怀，具体的帮助，使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得到鼓舞与激励。我很高兴地认识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徐调孚老先生，他曾在开明书店工作多年，熟悉文艺界出版界的情况，跟他谈话时受到很多的教益，得到许多的线索。我很早便读过巴金同志写的《家》、《春》、《秋》，得知他来北京开会，经登门走访，恳切地向他进行征集手稿。他说时间太久了，他设法找找，如果找到的话，一定赠给北京图书馆。他回上海之后，分几次邮寄来《家》、《春》、《秋》的原稿，《家》的原稿多已散失，现存的很少了；《春》、《秋》的原稿则是厚厚的两大册。曹禺同志的《日出》、《雷雨》已佚，他就把《北京人》的原稿赠送给了我们馆。那时，丁玲同志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获得了斯大林奖，也将此书的原稿征集到了。

虽然征集到不少的著名作家的手稿，但我认为还需要加倍努力，多方面去征集，我常常设想还有那些手稿还没有征集到，或找什么人去进行征集。联想到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曾经提到殷夫的《孩儿塔》手稿，这启发了我。柔石、殷夫等五位烈士的遗稿会不会是由鲁迅先生给保存下来了？鲁迅手稿大部份已保藏在我馆手稿库内，为什么没发现柔石等烈士的呢？是否另行保存了？还是拜访许广平先生去问问吧！通过拜访许先生和冯雪峰同志，几经周折，我终于征集到柔石、殷夫和冯铿三位烈士的手稿。还征集到叶紫日记手书原稿一册。这样一来，北图的手稿特藏库就更充实了。

为了征集翦伯赞同志的《中国史纲》原稿，去了几次燕东园，翦伯赞同志答应把这个手稿赠给我馆，他说等装订好了再送去。没过多久，我们就收到了翦先生的手稿，不仅装帧的很好，而且还做了锦套，翦先生亲笔写的书签。这样郑重其事地进行装帧，表达出翦先生宝爱自己的手稿的心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图书馆的重视与信任。

我曾请示领导是否去征集梁启超的手稿呢？经冯馆长同意后，便去拜访北大图书馆的梁思庄先生，又去拜访了梁的大姐梁令娴先生。得知梁任公的手稿墨迹连同他收藏的碑帖拓本全都在北京，梁任公收藏的碑帖很精致名贵，便一块向梁家进行征集动员。承蒙梁思成同志和梁令娴先生的热情捐赠，我会同中采组同志一块车载运回。从这批手稿书札中，发现有清代著名诗人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墨迹，还有康有为的书札，真是笔走龙蛇书法佳妙。在柳亚子先生的赠书中，发现有柳先生的手稿墨迹，最为重要的是有两册《南社纪略》，这是柳先生的亲笔原稿，为研究南社的第一手资料。就是这样积少成多地征集到作家学者的手稿一千多种，这里就不一一详述经过了。这些都是作家或他的家属们的无私捐赠。我虽然是尽了点心力，做了一些工作，但这是微不足道的。回忆往事，使我不禁怀念起那些令我敬佩的人们。感谢冯仲云馆长和赵万里主任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感谢从1954年—1957年组内仅有的唯一助手李纯敏同志，对新善本手稿的精心保管，从未出过差错，使我得以安心外出征集挑选，促使新善本手稿特藏库得以早日建成。往者已矣，今后尚有望于广大青年同志们，继续努力征集，使我馆新善本手稿库藏更加丰富完善。

1982年4月18日写讫

* 本文作者为原北图善本特藏部与图组副组长。